

汉译经典

EINLEITUNG IN DIE
GEISTESWISSENSCHAFTEN

精神科学引论

(第一卷)

〔德国〕威廉·狄尔泰 著 艾彦 译



译林出版社

汉译经典

〔德国〕威廉·狄尔泰 著
艾彦 译

精神科学引论

（第一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精神科学引论.第1卷 / (德) 狄尔泰著; 艾彦译. —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4.10

(汉译经典)

ISBN 978-7-5447-4963-3

I. ①精… II. ①狄… ②艾… III. ①精神 (哲学) — 研究
IV. ①B0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205625号

- 书 名 精神科学引论 (第一卷)
作 者 [德国] 威廉·狄尔泰
译 者 艾 彦
责任编辑 韩继坤
特约编辑 段颖龙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印 刷 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960×640毫米 1/16
印 张 20
字 数 223千字
版 次 2014年10月第1版 2014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4963-3
定 价 59.6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译者前言：文化哲学史 大师的扛鼎之作

——简评狄尔泰的《精神科学引论》（第一卷）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部《精神科学引论》（第一卷），系德国现代著名思想史学家、哲学家威廉·狄尔泰专注于探讨和研究人文科学领域的最重要的著作，也是他生前出版的同名著作的唯一一卷（在他生前，第二卷并未完成和出版）。在我们看来，无论是着眼于 19 世纪下半叶欧洲思想界出现的狄尔泰本人也曾经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科学方法大讨论”，还是从狄尔泰通过此书而对此后的包括诸多人文学科产生的广泛而又深刻的学术影响来看，此书都可以说是作为文化哲学史大师的狄尔泰精心撰述的一部扛鼎之作。

题目之所以定为“文化哲学史大师的扛鼎之作”，并不是为了进行国内学术界屡见不鲜的“炒作”，而主要是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考虑：第一，就我们所能掌握的资料而言，狄尔泰早在其学术生涯的初期就已经由于其《施莱尔马赫传》（第一卷），而变成声名远播的思想史大师了，因而说他是历史方面的“大师”并非过誉；第二，就这部《精神科学引论》（第一卷）而言，它可以說是狄尔泰生前出版的史论兼备而又以论为主的最重要的著作^[1]。而且，这部著作最突出的特点在于，狄尔泰在这里所说的“精神科学”的实质内容，基本上正是“文化哲学”所应当涉及的内容——尽管并不是“文化哲学”的全部内容^[2]。而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从这两个方面出发，简单地概述一下有关斯人此书

基本情况，为国内并不熟悉他的读者们呈现一些基本的背景性知识了。

一、作为“文化哲学史大师”的狄尔泰

我们之所以称狄尔泰为“文化哲学思想史大师”，主要基于下面两个方面的考虑：第一，虽然出于各种原因，他本人在我们今天的国内学术界并不是一个“炙手可热”的风云人物，其著作在当今中国内地的思想界也几乎没有出现，更不用说产生多大的影响，但是，就西方现代学术界而言，主要活跃在19世纪下半叶的他却对我们今天熟悉的几乎所有重要思想家诸如胡塞尔、海德格尔、马克斯·韦伯、阿多尔诺、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都产生过比较重大的影响；而且，除了这些颇有影响的思想家以外，他还对西方现代思想史的发展、对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对人格心理学研究，以及对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学理论和社会哲学思想所形成的流派，产生过比较直接和巨大的影响。此外，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曾经在西方社会之中盛行的三种社会思想潮流，即西方思想界和广大青年学生对于存在主义的持续兴趣，西方学术界对于科学哲学的关注，以及西方的某些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促使人们把研究的注意中心又一次对准了狄尔泰——比如说，存在主义哲学家们把解释学当做获得真理的一种方法的做法，本身就是从狄尔泰发源的。正因为如此，西班牙现代著名思想家、哲学家奥尔特加·加西特^[3]就曾经认为，狄尔泰是“19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

第二，狄尔泰本人虽然并没有撰写和出版以“文化哲学”或者“文化哲学史”为标题的体系性鸿篇巨制，但是，无论就他不拘泥于任何一个具体研究领域因而显得特别漫长的学术求索经历

而言，还是就他的著作在以人为研究中心的同时广泛地涵盖了哲学的本质、知识论、道德哲学、美学和精神科学的哲学、心理学、教育理论、思想传记、文学评论等范围广泛的各个方面而言^[4]，他的著述所涉及的范围与“文化哲学”所应当涉及的范围都是比较接近的；尤其重要的是，他的所有理论论述都是以历史研究为坚实基础和宏观背景的。因此，我们认为，虽然狄尔泰的著述并没有以“文化哲学”或者“文化哲学史”为标题，因而似乎不像有些思想家那样仅仅由于为某个学科命名便青史留名^[5]，但是，仔细阅读这部著作并且对文化理论有所思考的读者将会看到，他在这部著作之中对“文化”及其哲学的论述，尤其是结合历史研究进行的论述，是无愧于“文化哲学思想史大师”这个称号的。

（一）生平简述

威廉·狄尔泰于1833年11月19日生于德国莱茵兰市。他的父亲是莱茵河畔比布里希地方的一个对政治、历史和哲学非常感兴趣的新教神学家，母亲是一位乐队指挥的女儿，很有音乐天赋，因此，狄尔泰酷爱音乐，并且始终对音乐保持着浓厚的兴趣。

在威斯巴登完成了中学教育以后，狄尔泰于1852年开始在海德堡学习神学，以实现父母让他成为一名牧师的愿望。但是在不断学习的过程中，狄尔泰却对历史和哲学表现出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并且因此表现出每天学习和研究12—14个小时的惊人能力；为了更加广泛地涉猎其他民族的思想和文化成果，他不遗余力地努力学习希腊语、希伯来语、英语等，和朋友们一起阅读和钻研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莎士比亚等人的经典著作。而与其他著名思想家在这个阶段的学习历程略有不同的是，狄尔泰具有非常彻底的哲学反思精神，不愿意局限于任何一个狭隘的学术领域，因此，他不仅把自己的学习期拖得很长，而且即使在以

后成为富有成果的著名思想家的时候，他也仍然对自己提出非常高的要求，因而他虽然著述颇丰，但是生前并没有公开出版卷帙浩繁的著作。

1864 年，他以一篇论述施莱尔马赫伦理学的论文获得了博士学位，之后又以一篇更加广泛的论述伦理学的著作获得了大学教师任课程资格。1870 年，在基尔任教授的狄尔泰出版了他的《施莱尔马赫传》第一卷，这部著作当时就奠定了他作为杰出学者的地位，变成了他的学术研究的里程碑之一——尽管他并没有最终完成和出版这部著作的以后各卷，因而实际上并没有彻底完成这部著作。

1871 年底，狄尔泰应召前往布勒斯劳任教授；1873 年 11 月 19 日，他与卡塔琳妮·皮特曼订婚，婚后共生有三个孩子。在布勒斯劳期间，狄尔泰主要致力于研究精神科学的性质和方法，做出了他一生之中最杰出的学术贡献——他先是于 1875 年完成了《关于人、社会和国家的学科史的研究》，接下来又于 1883 年出版了《精神科学引论》的第一卷，还写作了这部著作第二卷的绝大部分手稿。1882 年，狄尔泰回到柏林，担任黑格尔曾经担任过的哲学教席，因而获得了他一生之中最崇高的学术荣誉。1900 年以后，他停止了研究班的课程。1905 年，他完成了他生前所发表的最后一部著作《诗和体验》，以后便完全离开了大学的教学岗位。在人生的最后几年之中，他还撰写了《精神科学之中的历史世界结构》。1911 年 9 月 30 日，正在舍伦的赛斯度假并进行学术研究的他，由于染上了传染病而猝然逝世，享年 77 岁。后来成为著名存在主义哲学家的马丁·布伯当时作为他的一个青年学生，帮助安排了他的葬礼。

除了上面提到的这些著作以外，狄尔泰还非常关注生物学和反驳实证主义等方面的学术进展情况，并且留下了包括涉及这些方面和其他方面的大量遗稿——建立在柏林的狄尔泰档案馆，已

经把这些遗稿共分为四类：A类是狄尔泰为研究德意志思想史所准备的材料，共90份，每份300多页；B类是有关施莱尔马赫的材料，共48份，是狄尔泰为写作传记而准备的材料；C类是论述心理学、知识论、哲学的本质等的文稿文学评论等，共108份，其中有一份竟达700多页；D类是藏书汇集，这些藏书中有狄尔泰的许多重要批注。

（二）关于“精神科学”

正如我们上面已经指出的那样，“人”就是狄尔泰的全部学术研究的核心；在他看来，人与动物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人始终处于由自己创造出来的“文化脉络”之中，并且在这种“文化脉络”之中不断地生存、创造和发展。正是基于这种基本观点，他认为，真正科学的哲学（不是以实证主义为突出特征的“科学哲学”）必须对社会科学及其地位、方法和概念予以特别的关注，使它们变成自己的思考对象，从而构建关于人的知识的科学，亦即构建“精神科学”的哲学——在这里，所谓“精神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en*）指的是包括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在内的几乎所有与人的知识有关的学科，具体说来，它们包括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心理学、法理学、文学，甚至哲学。因此，即使仅仅从语法角度来说，狄尔泰也主要是以复数的形式运用“精神科学”这个术语的。这样一来，虽然 *Geisteswissenschaften* 这个德语单词的英文对应词可以是“Human Sciences”^[6]，但是，*Human Sciences* 在这里从根本上说并没有把 *Geisteswissenschaften* 所具有的含义充分表达出来，而就 *Human Sciences* 的汉译对应词来说情况就更加明显了——无论如何，表示 *Human Sciences* 的中文术语“人文科学”仅仅涵盖了 *Geisteswissenschaften* 一部分意思，应当是不争的事实。

有必要强调指出的是，狄尔泰本人也是欧洲在 19 世纪下半叶出现的“科学方法大辩论”的积极参与者和受益者，因此，他在这部著作之中对社会科学及其地位、方法和概念的强调，尤其是在比较自然科学的相应方面的情况下进行的强调，是有其深厚的学术基础和社会文化背景的——囿于篇幅，这里无法详细论述这一点，只能以后再寻找机会加以论述了。

所以，为了准确地表达狄尔泰的著作和学术思想的含义、尽可能减少汉语读书界在阅读和理解他这部著作的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歧义和误解，我们在翻译和校对过程中，把在这部著作的标题和正文之中出现的 *Geisteswissenschaften* 一律按照德文原文严格地译为“精神科学”；而且，有时候为了更加明确起见，甚至还把这个术语的复数形式也表达出来，译成“各种精神科学”，特此加以说明。

至于“精神科学”的具体内容，相信认真阅读本书的读者自会得出自己的答案。我们认为，狄尔泰用这个术语表明的思想和学术倾向，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仍然没有过时——不仅就国内学术界而言，甚至就国际学术界而言，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究竟是什么关系？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究竟是不是只有不断追求形式化和精确化，舍此别无他途？这些恐怕也仍然都是有待进一步认真对待、系统探讨和深入研究的问题。因此，即使仅仅就这个方面来说，狄尔泰的这部著作所具有的意义也是不应当被忽视的。

二、作为狄尔泰的“扛鼎之作”的 《精神科学引论》（第一卷）

我们一向认为，无论一部著作的作者还是译者，都无法“越俎代庖”，亦即无法包办代替读者对这部著作的阅读、理解和得

出结论的过程，学术思想史发展的实际情况也早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作者或者译者所能够提供的，充其量只能是一些作为读者解读这部著作的背景性知识的材料和观点，这部《精神科学引论》同样也是如此。在简单介绍了有关狄尔泰本人的上述基本情况的基础上，我们打算提出以下几个方面的观点，以期它们能够成为国内读者解读这部著作的背景性知识的一部分。毋庸赘言，读者完全可以抛开这个部分，通过仔细阅读本书而得出自己的结论，甚至可以通过这样的解读，对我们这里的观点加以针砭。

（一）关于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差异

自从笛卡儿以来，自然科学技术和与之相对应的思想方式的发展，在促进哲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知识不断快速发展的同时，也越来越把它们自己与后面这些学科的种种区别表现了出来。从这种意义上说，19世纪欧洲出现的“科学方法大辩论”与20世纪初以来西方思想界对工业文明的反思和批判有所不同的是，它基本上对科学技术及其思想方法是持欣赏和崇拜态度的，因而无论是突出这些学科与自然科学的区别，还是尽力弥合这些区别的做法，绝大多数参与辩论者在骨子里基本上仍然认为只有自然科学知识的真理才真正具有普遍有效性；或者说，这些辩论者在理论方面所坚持的理想，仍然是设法使哲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在地位、作用和影响方面，达到与自然科学相媲美的地步。当然，这场辩论及其延续至今的影响，同时也促使西方学术界越来越重视这两类学科之间的联系和区别，因而推动了西方学术研究的相应发展。狄尔泰在这部著作之中对于“精神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差异”的论述，基本上就是在这样的思想脉络和宏观社会背景之中逐步展开的。

这里需要着重指出两个方面：

第一，自从 20 世纪初以来，特别是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思想界对工业文明的高度发展带来的各种社会文化后果的反思和批判，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着人们继续关注自然科学的思想方式和技术所特有的思维模式，这种关注在具有更多的批判色彩的同时，也促使人们比以往更加清醒和冷静地对待这样的思想方式和思维模式，对它们进行越来越深刻的批判反思，以期找到比它们更加适当的对待生活世界之诸方面的思想方式和思维模式。胡塞尔、舍勒^[7]、柯林伍德、桑巴特^[8]、特勒尔奇^[9]、马克斯·韦伯、威廉·詹姆斯等著名思想家在理论方面所进行的努力，其实都可以说是这种学术运动的组成部分。因此，狄尔泰这里的有关论述，必定会对我们进一步探讨这些问题，提供各个方面的启发。

第二，虽然已经经历了一百多年的争论和研究，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差异究竟有哪些？它们究竟是不是具有一致之处？这样的差异和一致之处究竟是什么关系？迄今为止人们对这些问题并没有得出一致的看法。一方面，包括狄尔泰这本书之中的论述在内的各种各样的有关论述已经比较丰富，但是另一方面，对于这些问题的解决则仍然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并没有取得多少实质性进展。那么，解决这些问题的出路究竟在哪里呢？

我们认为这样的出路主要由以下两个方面构成：

首先，对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各自的基本取向、预设前提、研究程序和方法，以及研究结论，进行细致、深入和全面的比较研究，从而使对于这些问题的解决具有坚实的客观基础；这样做不仅需要具有关于这两者的方方面面的广博知识，也需要具有相关的社会文化及其发展变迁的知识——因为所有这些科学都是在社会文化背景及其发展变迁过程之中产生出来和发挥作用的。

其次，对有关这些问题的各种研究论述进行全面彻底的批判、反思和扬弃。不仅仔细考察有关研究者说了什么，更要深入考察他们是出于什么意向、站在什么立场上、运用什么研究方法和程序，来得出他们的结论的。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说，狄尔泰在这里做出的有关论述，值得我们加以重视、研究和扬弃，因此是非常有意义的。

（二）关于科学研究的历史基础

虽然黑格尔曾经说过一切哲学都是哲学史，但是，就当今国内学术界的相当一部分理论研究和理论著述而言，人们对其理论研究的历史基础的重视程度还是不够的。这具体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就理论研究和著述本身而言，人们的注意力往往主要集中在“言之有据、持之成理”上，也就是说，往往集中注意论据的可靠性和论证过程的严密性，因而不怎么注意前人和同时代人已经就这个方面进行过哪些研究和论述，更不用说注意这些研究所特有的立场、出发点、方法论视角，以及研究程序和结论的先后传承关系和影响关系了。就学术思想研究本身所具有的特点和要求而言，这里存在的“浮躁之气”是显而易见的。其次，更加重要的是，在进行理论研究和论述的时候，人们往往只重视研究对象的现状及其各个方面的关系，而不怎么注意这种现状和这些关系的历史演进过程和生成性联系——而这样一来，得到注意和研究的，严格说来便仅仅是对象当下的“横断面”和“共时性侧面”，因而至关重要的作为人们研究“所以然”的最重要现实基础而存在的“前后生成关系”和“历时性侧面”，就被置于可有可无的境地了。至于这样的做法究竟会导致什么结果，显然是用不着多说的。

阅读本书的读者可以看到，对“精神科学”之诸方面加以研

究论述的狄尔泰，早在一百多年以前就已经在自己的实际研究过程中，开始尝试克服这种做法的弊病了——他在《精神科学引论》（第一卷）这部著作之中进行的所有各种论述，都是以他自己的系统深入的历史考察为基础的。虽然他这样做并不能完全保证他的结论“绝对可靠”、“无懈可击”，但是，这种做法却在表明一种严谨的、扎扎实实的研究风格的同时，使他的论述具备了深厚的历史感和可靠感。在这种情况下，他不仅增强了自己的论述的说服力，同时也使他自己的主张与自己的研究方法完全统一起来了——因为在他看来，人类生活所具有的最基本的特征之一就是其历史性。我们认为，对于任何一个研究者来说，研究对象的历时性维度都是至关重要、不可或缺的，这不仅是因为这种维度构成了他（她）研究“所以然”的现实基础，同时也是因为通过对研究对象进行狄尔泰式的历史研究和考察，研究者就有可能不断地提高自己的人生境界、拓宽自己的学术眼界，进而达到对研究对象的更加全面、深入和准确的把握^[10]。当然，这里所涉及的问题很多、很复杂，我们只能待以后有机会的时候再一一加以论述了。

（三）对“形而上学”的批判

在这部著作中，狄尔泰从其“精神科学”观和历史观出发，对“形而上学”的剖析和批判可以说是不遗余力的，而且他在这种批判的基础上直截了当地宣告了形而上学时代的结束。因此，早在一个多世纪以前，他就非常明确地宣告了以“追问存在”为基本特征的形而上学时代的结束，也宣告了以“追求知识”为基本特征的认识论时代的来临，所以他的学术眼光可以说是非常犀利的。我们从他在这部著作之中的论述可以看出，他是从集中关注和研究人类的社会文化实在的目的出发，通过进行

历史的批判考察和心理学的研究，对“形而上学”及其各个方面进行批判和扬弃的。而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针对他这种独具慧眼而又富有历史依据的研究论述，提出以下两个问题了：

第一，从社会文化维度和心理学的维度来看，古代的西方哲人为什么要提出“存在”问题，并且殚精竭虑地建立各种各样的理论学说加以探讨和研究？也就是说，他们这样做是仅仅出于“爱智慧”的理智方面的兴趣，因而试图通过设定某种“第一因”、“形式”或者“实体”而使这样的兴趣得到满足，还是出于比这种兴趣更加深刻的心理感受和情感需要而去这样做呢？通观这部著作，狄尔泰对此并没有加以明确和细致的论述，而是基本上停留在对社会文化变迁史、学科流变史和概念流变史的考察之上了。这样做虽然是非常必要和宝贵的，但同时也是不够的，因为说古代西方哲人仅仅出于理智方面的兴趣而这样做，显然是比较肤浅的——不仅海德格尔已经从他自己特定的存在主义角度出发表明了这一点，而且，无论这样的兴趣还是心理感受、情感需要，都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与这些作为个体的哲人的生存境遇、人生境界和学术眼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后者的产物。所以，我们如果真正认真地关注和研究主体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对他（她）所产生的影响，也会认为更加深刻的心理感受和情感需要才是这些西方哲人这样做的基本动因。

第二，无论西方哲人这样做究竟是仅仅出于理智方面的兴趣，还是出于更加深刻的心理感受和情感需要，当其学术思想史上出现了以“认识论”代替“形而上学”的转变的时候，这样的兴趣或者感受和需要究竟是仍然存在还是已经消失，抑或转化成其他的某种东西了呢？对于这个既与心理学维度有关、又与社会文化维度有关的重要问题，狄尔泰同样没有做出明确和细致的论述。

当然，今天对狄尔泰提出这样的问题似乎有些“苛求古人”，但是，我们并不仅仅是出于“吹毛求疵”的嗜好才这样做的，尽管这样的“吹毛求疵”也是进行学术研究所必需的；而且，涉及这个问题的研究者如果不对这种最基本的层次进行探讨，他对既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也必然会具有作为研究者的个人特色的研究对象——各种哲学理论体系的剖析，就不可能是深刻和完备的。我们认为，即使英国当代著名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所说的具有独立性和客观性的“世界Ⅲ”，也同样是由一个个从事学术研究活动的、活生生的个体的建构活动过程及其结果构成的，而且，这样的现实社会个体也随时随地都会受到这样的建构活动的影响，由于这种建构活动的持续进行而不断出现其主观世界的发展变迁。所以，归根结底，个体研究者的生存境遇、人生境界、学术素养、心理感受和情感需要，都会在各种各样的程度上影响其包括哲学研究活动在内的各种研究活动及其结果——所谓“哲学家是时代精神的代言人”、“哲学是时代精神的体现”，无一不是以作为个体的研究者所具有的这些方面为中介、基础和前提的。

因此，狄尔泰在这里对“形而上学”的批判，不仅可以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它为什么会在当代西方学术的发展过程之中受到研究者的冷落甚至抛弃，同时也可以使我们进一步意识到有关的、更加深刻的学术问题，推动我们通过自己的研究得出更加科学的结论。

（四）关于研究对象的经验性社会文化内容

在《精神科学引论》（第一卷）之中，狄尔泰的研究论述所体现出来的另一个鲜明的特色，就是突出强调研究对象的经验性社会文化内容；从我们上面已经提到的他对“精神科学”的界定

之中，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从表面上看来，此举似乎只是他在批判地考察形而上学的历史，确认形而上学已经成为过去的基础上，或者只是在欧洲“科学方法大辩论”的宏观背景下，所做出的一种理论研究选择而已；但是实际上，在今天的我们看来，用“高瞻远瞩”、“独辟蹊径”来评价他这种做法，似乎并不过分。因为就他当时所处的学术环境而言，研究者所关注的基本上仍然是哲学和哲学史方法论层次之上的问题，几乎没有人从这种具体的经验内容层次之上考察与哲学方法论有关的各种问题——无论我们今天所熟知的李凯尔特、文德尔班，还是稍后一些的胡塞尔、舍勒等，几乎都是如此。我们认为，狄尔泰这种做法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和价值，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非常清楚地看到。

第一，形而上学的式微和认识论的崛起本身便意味着，研究者开始从探讨最抽象的“第一因”、“形式”、“实体”或者“存在”，逐步转向了研究和探讨比较具体的认识条件和认识对象，因此，他们的研究层次相对来说也变得更加具体了——无论具备认识能力和认识条件的、作为个体而存在的主体，还是作为哲学研究对象的认识对象，无不处于一定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背景之中，并且随着这样的传统和背景的发展变迁而发展变化。所以，狄尔泰这种做法显然极大地拓展了哲学研究——无论本体论研究还是认识论研究——的视界和范围，因而在使认识论研究具体落到实处的同时，使哲学研究重新获得了生机和活力。尽管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他这种做法及其结果在当时并没有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并没有导致哲学研究出现向社会哲学和文化哲学的明显转化，但是，这种情况并不能抹杀狄尔泰的理论努力所具有的意义和价值，而且，由于实证科学的基本研究取向在今天依然处于主导地位，他这样的努力也仍然是非常值得我们加以重视和研

究的。

第二，就各门具体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而言，由于各个方面的原因，它们在元理论和方法论层次上所得到的成果是非常有限的——不仅就狄尔泰那个时代来说是如此，就我们今天的情况来说也同样是如此。如果我们可以借用“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的差异”的说法，那么，在我们看来，就存在于西方思想脉络之中的各种科学而言，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最大差异之一就是，各种自然科学几乎都可以直接借助于西方的形而上学的形式推理传统来探讨和研究没有生命和情感的自然对象，而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则显然根本不具备这样的便利条件^[11]。一般说来，任何一种科学的突破都取决于其元理论和方法论研究的突破，这似乎已经成为学术思想界的共识。而狄尔泰在这部著作之中给我们提供的，恰恰就是对于这些“精神科学”的方法论问题的研究和论述。因此，无论他的具体结论具有多少偏差和不适当之处，这些具体结论都可以构成我们进一步研究这些问题的“参照系”之一，都值得我们加以认真的借鉴、批判和扬弃。

关于狄尔泰这部作为其学术研究的扛鼎之作的《精神科学引论》（第一卷），我们目前只能提出上述这些非常不成熟的观点，供有兴趣深入研究和批判这部著作的读者参考和批评。我们相信，这部著作的翻译出版，对于推动我们国内的文化哲学研究、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方法论研究，以及推动哲学研究向社会哲学和文化哲学的转化过程，都将发挥非常重要和宝贵的作用。